



谭一青◎著

MAO
ZEDONG

决胜之道

毛泽东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

决胜之道

谭一青◎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决胜之道 / 谭一青著. —2 版.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06-9691-9

I. ①毛… II. ①谭… III. ①毛泽东军事思想: 战略思想—研究
IV. ①A84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29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4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10×1000 1/16 15 印张 195 千字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前言

FOREWORD

毛泽东，作为中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人物，兼具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的气质风采于一身。把上个世纪的中国称作“毛泽东的时代”，一点也不为过。毛泽东给这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了太多的变化。了解毛泽东就了解了中国一百年，理解了毛泽东，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现代的发展与变化。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战略家，战略思想是他的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毛泽东决胜之道的根本。只有深入理解毛泽东的战略理论，才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作的有关军事问题的大文章中，除了 1934 年完成的小册子《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曾提及此书 1934 年在江西出版，目前尚未找到原件。），主要讲述游击战术问题外，其余均以论述战略问题为主。这与毛泽东擅长以哲学方法分析战争实际的思想方法联系在一起。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政治、哲学有着浓厚兴趣，并立志探讨宇宙世界的“大本大源”，战争年代，他更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哲学方法观照战争，从根本上把握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发展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过程。

从事毛泽东军事理论研究的许多学者曾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体系作过多种不同归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以为，毛

泽东的军事战略理论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并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他的战略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当时战争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不可能像一个书斋理论家那样从容不迫地研究战略理论的框架、结构，并对它作更多的学术论证。因此，本书旨在通过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战略指导理论的提出与实施过程，深刻再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的主要体现者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揭示其克敌制胜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在这本书中，我采取了以史为经的纵向写作方法，基本循着实践发展的自然道路，从战争实践与战略理论的结合与发展中分析战略理论的内涵与意义。由于时间与篇幅的限制，这本书难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全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过程，只能选取每一阶段有代表性的理论加以剖析，其中又难免带有作者的主观倾向。一些重要的缺漏与浅薄之处，尚待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中不断加以补充与完善。

第一章 北伐战争战略指导及其对中国革命战争初期战略指导的影响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思想 / 1

北伐战争的战略指导 / 6

北伐战争战略遗产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 12

第二章 从“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

十六字诀的形成及其战略意义 / 19

诱敌深入的提出及其运用 / 26

第三章 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战争总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理论的初步形成 / 37

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42

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面”对“点、线”的战争 / 47

第四章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的全面总结

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与毛泽东军事著作的产生 / 53

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 / 62

(一) 兵民是胜利之本 / 62

(二) 积极防御 / 64

(三)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 / 69

(四)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 71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战略指导之比较

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 / 75

抗日战争初期防御作战的战略指导 / 82

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 / 87

消极等待与积极抗日 / 93

第六章 军事战略转变和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指导

正确分析战争情况，适时进行战略转变 / 102

战略转变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 108

对弱小者来说，首要的问题是避免不利决战 / 110

用战役战斗的决战胜利，创造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 / 114

实行战略决战，夺取战争胜利 / 118

第七章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际战略

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对英美关系 / 124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对苏政策 / 127

努力建立与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 / 132

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 134

在国共冲突中力争“中立美国” / 138

美苏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 / 143

第八章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

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 / 149

根据敌情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指导 / 160

(一) 作战形式上因敌变化 / 161

(二) 作战方法上扬长避短 / 166

以打促谈,力争有利条件下的和平 / 171

第九章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近代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斗争的启示 / 181

利用矛盾的制衡战略 / 187

积极防御的威慑战略 / 193

统一战线的联合战略 / 199

第十章 军事战略理论在和平时期的发展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发展 / 205

人民战争理论的发展 / 212

核战略理论的发展 / 217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考 / 221

参考书目 / 229

后 记 / 231

第一章

北伐战争战略指导及其对中国革命战争初期战略指导的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国共合作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逼迫下拿起枪杆子的，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没有现成的教科书。除了苏联十月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外，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经验对共产党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与策划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走城市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初期的战略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思想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比较早地

认识到暴力革命对于改革中国社会的重要性。1894年11月，他在美国檀香山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时，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反对满族贵族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指出：改革中国，“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页。）随后，他积极奔走，发行革命债券，募集起义军费，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9月重阳节，兴中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结果因起义机密泄露，很快就被清政府的两广总督派兵镇压了。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总结起义经验，提出了建立起点、张威四方的武装斗争总战略。他说：“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踞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这个总战略的核心在于“割据”。孙中山认为，武装斗争开始时，必须先造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也就是先找到一个立足点，然后以此为基地，发展革命势力，“张势威于四方”，最后达到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目标。1897年，孙中山进一步将他的战略思想概括为“侵三江踞两湖直捣幽燕”。

对于武装割据的“起点”，即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曾有一个“星星之火”的比喻。他说：发动的“起点”，“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并说：“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孙中山认为，“不择定一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也”，因此，革命的起点必须选择得当，“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这就是说，革命的起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能迅速集合一支武装力量；第

二，便于接济武器装备、军饷物资；第三，起义之后，能迅速地形成进取态势。

最早的起点选在了广东。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他比较熟悉，同时，孙中山也认为，东南各省有许多民间的秘密组织，可以迅速造成割据的武装力量；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孙中山当时从事武装斗争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海外华侨的接济，军火也主要来自国外，因此广东被看作是便于接济的地方；此外，广东举义以后，向东南各省发展，也甚为便利。不过，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孙中山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建立长期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也没有认真思量，因此，他的武装起义思想带有一定的盲目速胜因素，认为清王朝不堪一击，指望革命起义一举成功。

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指导起义的过程中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了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方案。当时，同盟会内部曾就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进行过讨论。有的革命党人主张实行“首都革命”的方法，“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以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实行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方法。这一派的战略实际上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建立起点、张威四方战略的一个发展。黄兴认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国民革命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因此，“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黄兴

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 页。）

我们姑不论黄兴等人对于英法革命的认识正确与否，但他们对于革命力量的考虑却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首都”确实还没有聚集起足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力量，相反，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数省，存在着不少反清的会党和有革命倾向的新军。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战略有利于集中革命力量，调动全国反清力量的积极性，孤立和打击敌人。

于是，同盟会在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进行策动新军起义的工作。1910 年和 1911 年，同盟会在广州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1911 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入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衙门，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军部分死难烈士被群众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后人盛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一共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缺少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因此都是各自为战，此起彼落，并未实现如总战略所设想的一地发难，全国响应的局面。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传了革命，振奋了人心，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是一地发难，全国响应总战略的一次成功实践。

当时，由于武装起义屡屡失败，革命党人感到策动新军暴动是一条革命的捷径，比革命党人自己充当敢死队战斗力更强，因为新军士兵毕竟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战士。所以，许多革命党人不辞艰险，纷纷打入新军，去做军队的宣传和策反工作。到了 1911 年 7 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已经吸收了近 5000 余成员，形成了一股比较有力的军事力量。4 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湖北革命党人曾想率新军暴动以为响应，但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武昌起义也就作罢了。

9 月，四川保路风潮鼎盛，武昌革命党人遂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经过一番周折，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打响。起义军打死反动军官，占领军械局，迅速攻占总督署。10月11日上午，武昌为起义军完全占领。此时之革命军斗志极为旺盛，当天下午又一举拿下了汉阳，12日拿下了汉口。起义发动后仅两日，武汉三镇均已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像一声平地而起的春雷，震醒了中华大地。不到两个月，内地18个省中便有14个省举起义旗，宣告独立。清王朝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

武昌起义后的12天，湖南首起响应。早在武昌起义以前，湖北、湖南两省的革命党人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曾互相约定，无论哪方率先起事，另一方必在10天内起兵响应。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率领会党，联络新军起义，向长沙城发起进攻。清朝驻长沙巡抚余诚格闻风逃跑，起义军顺利占领了长沙。江西新军于10月23日在九江起义，清朝道府两署闻风丧胆，逃之夭夭。起义军推举新军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同盟会员李烈钧当了都督。李烈钧下令控制九江炮台，封锁长江，拦截上行船只，断绝了汉口清军的水路供应，大大支援了武昌起义军，也使清廷大为震动。

随后，安徽、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江苏、山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

辛亥革命虽因武昌起义的胜利取得了迅速成功，但由于在政治上缺少一个根本的变革，政权大多数仍在旧势力的手中，所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毛泽东曾说过，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这是个胜利，但同时它也失败了，说它失败，是因为它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封建的反动本性逐渐暴露，孙中山再次兴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反对北方军阀政府的护法战

争。屡起屡仆之后，孙中山痛定思痛，于1918年至1919年在上海发愤著书，总结革命经验。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表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必须经过武装斗争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他制定了指导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新战略：驱逐桂系军阀，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两广，扩展军事实力，与北方政府形成武装对峙；以西南各省为依托，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孙中山认识到，“惟有重新革命，以尽去此篡窃之人，同时荡涤一切官僚腐败之系统”，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163页。）至此，孙中山基本确定了建立南方革命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伐的战略思想。

1920年10月孙中山领导下的粤军终于以武力赶走了把持广东数年的桂系军阀势力，于第二年建立了南方革命政府，创造了南北政府武装对峙的新局面。

北伐战争的战略指导

孙中山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对于北洋军阀的政治统治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把这个对立的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北洋政府决定利用桂系军阀充当先锋。1921年5月20日，北洋政府下达了讨伐南方令，命令桂系军阀陆荣廷出兵进攻广东。陆荣廷为了取得北洋政府的支持，宣布取消广西“自主”，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两粤边防督办，6月中旬率桂军向粤桂边境进袭。同时，陆荣廷又催请北洋军立即派兵支援桂军。

孙中山指挥广东粤军兵分3路，迎击桂军。在粤军的猛烈进攻下，

桂军节节溃退。9月26日，粤军占领龙州。历时3个多月的粤桂战争，以桂系军阀集团的覆灭而告结束。孙中山高度评价这次驱桂之役，说此役“出桂人于强盗之手，使两粤联为一气，固我所基，进而解决大局”。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驱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决心率师北伐，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任。孙中山对讨桂归来的粤军将士们说：“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统一中国。”（《民国日报》1921年9月14日。）

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南方革命政府的国会提交“北伐案”，获得通过，遂着手准备北伐事宜。在此前后，孙中山基本确定北伐战争实行“分兵出击，突破中路”的战略方针，其基本要点有三：

第一，合西南全力攻之，即联合滇黔川等各路人马共同完成北伐大业。当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北伐军仅3万人，在实力上与北洋军阀差距很大，孙中山说：“吾人军队不多，军器、训练均不甚良，形式亦不及北方之美观。”（《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页。）因此，必须联合同盟军。而孙中山指挥粤军剿灭桂系陆荣廷部之后，西南各省军阀均慑于南方革命政府之声威，同时也想乘机扩大地盘，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伐，故孙中山提出了“合西南全力攻之”的北伐统一战线战略。

第二，移师湘境，中路突破。当时，北伐军的当面之敌是盘踞两湖、京汉铁路沿线的吴佩孚。尤其是在湘的吴军扼住了北伐军北进之咽喉，故而中路突破，可将北伐锐气用在刀刃上。

第三，分道出兵，会师武汉。中路突破并不意味着将西南军力集中一处单向出击，而是采取分路出击的方法。这一点，孙中山部分地采纳了蒋介石的战略建议。蒋介石曾于1921年1月10日向孙中山提交一份《军事意见书》，其中关于北伐战略方针问题，他认为，“根本解决之计划，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东北为假定目的地，以后作战

计划，虽因时而定，但不可不以此为大纲”。至于北伐路线，他建议预定分三路北上，以四川三师“出湖北，上京汉铁路。以广东三师平定东南后，即由南京向津浦铁路前进，以其余六旅，由海道出秦皇岛”。（《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55 页。）孙中山计划的分道出兵则是：一路由滇、黔、赣各军组成，出击赣南、鄂东；一路由广东北伐军主力组成，直攻武汉；另一路由川军沿长江上游出击，攻击宜昌，顺流而下，最后三路大军会师武汉。

1922 年 3 月 26 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北伐事宜，会议决定放弃原定从湖南北上的作战计划，改由广东入赣，由江西北上的路线。5 月 9 日，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在广东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大会，13 日，北伐军分 3 路向江西发起进攻。经过 3 个月的英勇作战，6 月 13 日，北伐军占领赣州。随后，一路发展扩军为 5 万余众的北伐军，又兵分 5 路准备直捣南昌。然而，就在北伐进展顺利的关键时刻，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使得祸生肘腋，气势正盛的北伐之师受到顿挫。

就在孙中山率师激战于江西战场的时候，驻防广西的陈炯明粤军旧部叶举、翁式亮等却在陈炯明的密电下，悄悄回师广东。坐镇惠州的陈炯明则加紧备战，接收兵工厂，不许驻韶关的北伐军擅自回省。一时弄得广东人心惶惶，秩序大乱。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廖仲恺电请孙中山返回广州坐镇，以镇慑邪气。孙中山由北伐前线回到广州以后，致电陈炯明，要他“速来省共商大计”，遭到陈炯明的拒绝。

6 月 16 日清晨，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以 4000 兵力包围了孙中山的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于深夜的枪林弹雨中幸运地穿过叛军的包围，跑到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附近的宝璧舰上避难。17 日，孙中山又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此后，孙中山随舰移动于珠江水面上 60 多天，盛暑鏖战，临危不惧，向陈炯明叛军进击。

北上途中的北伐军奉命回师讨伐陈炯明，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

不得不向江西、湖南退却。孙中山亲自筹划的第一次北伐遂告夭折。

陈炯明的教训，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军的建立不能依靠现成的军阀队伍，必须从根本上做军队的改造工作，才能建立一支为党为国效力的革命军队。此后两年中，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建立黄埔军校，重新组建北伐军。1924年9月，孙中山又一次在韶关誓师北伐，随后率军入赣北上。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第二年3月病逝于北京，临终留下“遗嘱”，希望同志继续努力完成其未竟事业。

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继续准备北伐。1926年4月，广东国民政府着手制定北伐战略。其时，国民革命军中的将领们意见不一致。谭延闿、程潜主张先进攻湖南，由湘北上；朱培德则力主沿袭孙中山北伐的路线，先行攻取江西，由赣北上。双方相持不下，于5月制定出一个两路进军的方案，即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攻，既打吴佩孚，又打孙传芳。

这时，共产国际派给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顾问加伦从苏联述职回到广州。加伦认为，两路进攻的方案势必要同两个军阀同时作战，分散兵力，同时，粤闽边境还有可能受到孙传芳军入侵的危险，因而力主修改原定方案，提出北伐军首先在湖南境内作战的建议。加伦将他的建议提交6月23日军事委员会研究。军事委员会决定采纳加伦的建议，确立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首先集中兵力进攻湖南、湖北，占领武汉，消灭直系吴佩孚；对新直系军阀孙传芳则利用他暂时中立的立场，等到消灭吴佩孚以后，再消灭孙传芳；在打吴、孙之时，利用北方张作霖的观望态度，稳住张作霖，待解决吴、孙以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1926年8月印发的《北伐宣传总纲》对北伐战略作了简要说明：“分析国内的反动形势，目前政治工作，应采取逐个击破政策，即是对吴攻击，对孙妥协，对张放弃，以占领武汉时再采取第二步的策略。”